·经济学·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边疆地区开放发展的绩效分析

——基于1992—2020年边疆9省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李光辉，石福才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的加快实施，对于加快推动中国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中国边疆9省区1992—2020年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变化、边疆开放对边疆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来看：中国边疆地区开放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是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不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使得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尚未充分显现，边疆区位优势动力转化不足抑制了开放战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国边疆地区应加大投资结构优化力度，不断提高区域互联互通水平；加快集聚产业要素，加快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推动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边疆开放；绩效分析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23)03-0171-08

DOI:10.13624/j.cnki.jgupss.2023.03.020

新中国成立以后，区域经济发展先后经历“均衡—非均衡—均衡”的发展路径。1992年，中国沿边开始实施开放战略，先后经历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国内国际双循环等国家战略，边疆地区发展迎来了重大机遇，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边疆地区成为事关国家开放发展的重要前沿，成为连接“内”“外”的重要节点和枢纽，肩负着前所未有的新使命、新机遇。加之经济进入新常态，东部产业转移加速，边疆的开放发展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学术界对边疆开放发展的绩效评价逐步成为研究的热点话题，如Junjie Hong等实证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体系的构建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公路和铁路的投资效果更为明显。[①]Angelopoulos K等通过研究希腊1960—2000年的数据，发现税收财政政策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②]Borensztein等发现FDI在较为落后地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必须在该地区的人力资本平均水平越过0.52年的基础上，才会显现出正向的效应。[③]余稳策、张雪妍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环境三个视角出发对经济新常态条件下中国沿边开放型经济发展绩效进行了

基金项目：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广西发展战略研究院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李光辉，吉林农安人，广西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边疆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石福才，广西罗城人，广西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① Junjie Hong, Zhaofang Chu, Qiang Wang.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 *Transportation*, 2011, 38: 737-752.

② Angelopoulos K, Aphilippopoulos. “The growth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in Greece 1960- 2000”, *Public Choice*, 2007, 131: 157-175.

③ Borensztein E, Gregorio J D, Lee J W.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8, 45: 115-135.

分析；[①]霍强通过动态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就业率上升、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本积累是影响边疆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技术进步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渠道则不明显。[②]郭树华等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渠道和对外开放程度对边疆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影响显著。[③]黄伟新、龚新蜀从开放基础、开放程度、开放潜力三个维度选取指标，并用因子分析法计算出综合得分，得出不同区域的边疆地区开放程度存在差异的结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各异。[④]熊灵等对1978—2009年的省际开放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经济发展存在空间相关性，贸易开放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正效应，而且会随着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产业层面的空间效应体现了产业特征，与整体经济并不完全相同。[⑤]姚书杰通过研究发现，沿边开放和产业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段性特征；而且保持高经济增长率对沿边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至关重要。[⑥]

基于现有研究，本文着重研究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边疆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的边际贡献：首先，对边疆30年经济发展进行实证分析，丰富了边疆经济研究成果。其次，将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和边疆开放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为边疆经济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提供思路。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为下一步边疆开放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角度看：魏四新、郑娟认为固定资产投资通过三个方面对经济增长起作用：一是对经济增长直接起较大的拉动作用；二是投资改变了产业结构，使其往更高级方向发展，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三是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民营资本的发展加快了市场化进程，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⑦]边疆地区正处在开放开发的机遇期，其资源、劳动力、环境等优势为吸引国际和国内大量的投资提供了可能，可以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从而促进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率的提高，不断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Rostow认为产业部门的变动会带来经济的增长，如果具有优势的主导产业依靠发达的科学技术水平实现快速发展并且带动与之相联系的产业，将会提升区域的经济增长水平。在产业结构优化中，优势产业起到重要作用，体现在回顾效应、旁侧效应以及前向效应。[⑧]边疆地区通常是开放开发的洼地，自然资源富集、劳动力成本低廉，可以吸引有关产业企业到这些地区投资，使边疆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进而推动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从而加速经济的增长。

从对外开放的角度看：亚当·斯密认为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生产环境当中，一个国家或地区很难达到资金投入需求与资金积累的平衡。因此，对外开放能够引进的不只是外国资本，还有生产技术、稀缺资源、

① 余稳策、张雪妍：《中国沿边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绩效评价》，《统计与决策》2017年第24期。

② 霍强：《“一带一路”视角下沿边省区开发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生产力研究》2018年第3期。

③ 郭树华、蒙昱竹、梁任敏：《中国沿边省会城市开放程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华东经济管理》2016年第4期。

④ 黄伟新、龚新蜀：《我国沿边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评价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经济问题探索》2014年第1期。

⑤ 熊灵、魏伟、杨勇：《贸易开放对中国区域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1987—2009》，《经济学(季刊)》2012年第3期。

⑥ 姚书杰：《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沿边开放的绩效评价——基于1993—2014年沿边省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16年第5期。

⑦ 魏四新、郑娟：《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基于陕西1978—2013年数据分析》，《调研世界》2014第10期。

⑧ Rostow, Walt Whitman,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pp.89-105.

能源等等，同时扩大生产时会产生很多工作机会从而吸引外国劳动要素的进入。边疆地区通过开发开放扩大了自身和周边外部市场的需求，有助于扩大自身消费和出口贸易，进而推动技术进步、加快人力资源积累和体制机制创新，加快要素之间的流动，最终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均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假设，并通过建模开展实证研究。

二、模型、方法和数据

（一）变量解释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相关变量解释如下：

1.经济增长速度（y）

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国家或者区域反映经济发展状况的动态指标，通常用来检验一个国家或者区域经济发展的活跃程度。由此，本文运用经济增长速度作为因变量，来衡量边疆地区经济的绩效水平。

2.固定资产投资（FAI）

投资作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对于推动一个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亚当·斯密在其著名著作《国富论》中就详细阐述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乘数效应，资本的投入会使得国民收入成倍增加；索罗模型和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资本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以边疆9省区历年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自变量，考察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3.产业结构（IS）

产业结构是指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产业结构的变化一方面为某些行业带来良好的市场机会，另一方面也会对其他行业带来生存威胁。通常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服务业的重要性会与日俱增，服务业的比重会日益扩大，服务业从业者有较大的市场机会。同时为了了解边疆9省区的工业化进程，本文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TS）与第二产业增加值（SS）的比重作为产业结构的度量，其公式为：

$$IS_{it} = TS_{it}/SS_{it}。$$

4.边疆开放（BO）

对外开放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衡量的方式有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对外交流等各个方面，其中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吸引外资的能力也是一个区域开放的重要标志。因此本文采用对外贸易总额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开放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mathrm{BO}_{it} = \mathrm{TFTV}_{it} + FDI_{it}/GDP_{it}。$$

（二）模型及方法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构建的实证模型如下：

$$\mathrm{y}_{it} = \alpha_i + \beta_1 ln\mathrm{FAI}_{it} + \beta_2 IS_{it} + \beta_3 \mathrm{BO}_{it} + \gamma_{it}\mathrm{Control}_{it} + \mu_{it}。 \quad (1)$$

其中，y表示经济增长速度，α_i为地区不可观测效益，lnFAI_{it}表示固定资产投资的对数值，IS_{it}表示产业结构，BO_{it}表示对外开放度，$\mathrm{Control}_{it}$表示控制变量，μ_{it}是独立同分布的随机误差项，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

由于影响边疆经济增长的因素较多，不仅仅是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以及边疆开放三个因素，还

会有如劳动、技术、消费、政府政策等影响因素。为了更好检验三个要素对边疆经济增长的影响，参照Frank的研究，用因变量和自变量的交叉项作为控制变量。[①]进一步可以得出模型公式为：

$$y_{it}=\alpha_i+\beta_1 \ln FAI_{it}+\beta_2 IS_{it}+\beta_3 BO_{it}+\beta_4(y_{it}*\ln FAI_{it})+\beta_5(y_{it}*IS_{it})+\beta_6(y_{it}*BO_{it})+\mu_{it}。\quad (2)$$

再进一步进行差分处理后可得模型：

$$\Delta y_{it}=\beta_1 \Delta\ln FAI_{it}+\beta_2 \Delta IS_{it}+\beta_3 \Delta BO_{it}+\beta_4(\Delta y_{it}*\Delta\ln FAI_{it})+\beta_5(\Delta y_{it}*\Delta IS_{it})+\beta_6(\Delta y_{it}*\Delta BO_{it})+\Delta\mu_{it}。\quad (3)$$

在分析方法上，采用边疆9省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虑横截面个体造成的不同影响，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在使用两步广义矩估计(HAC-GMM)方法估计参数时，采用面板稳健性标准差来解决$\Delta\mu_{it}$的相关性问题，使用解释变量的差分项和滞后项解决$\Delta y_{it}\times\Delta\ln FAI_{it}$、$\Delta y_{it}\times\Delta IS_{it}$、$\Delta y_{it}\times\Delta BO_{it}$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最后用Hansen的有效矩估计的J检验统计量进行过度识别检验。

(三)数据来源

以广西、黑龙江、内蒙古、辽宁、吉林、新疆、云南、甘肃、西藏等边疆9省区1992—202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模型中所涉及变量的原始数据来自边疆各省区统计年鉴、历年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官网以及中经网宏观数据库等。同时，利用移动平均法补齐个别缺失数据。

三、实证分析

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其中不同时段由于相应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不一致，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影响。中国边疆自1992年开放以来，先后经历2000年西部大开发、2001年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12年经济进入新常态、2013年“一带一路”等关键节点的影响，会形成不同的阶段特征。基于以上因素考虑，本文把相应数据分为1992—2013、2014—2020两个时段，进行面板数据分析，分别考察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边疆开放等因素对边疆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新时期下中国边疆开放发展的经济增长绩效

	Δg		
	1992—2020	1992—2013	2014—2020
ΔlnFAI	5.2329*** (1.9176)	0.5294 (1.5492)	2.2150 (2.7680)
ΔIS	−0.9251 (0.9956)	−1.1210 (1.2549)	−0.2111 (5.4615)
ΔBO	0.6181 (0.7975)	0.5550* (0.3262)	9.3774*** (1.2320)
Δg*ΔlnFAI	2.0629*** (0.6809)	3.8601*** (0.5044)	1.8605 (1.2662)
Δg*ΔIS	1.7057** (0.6690)	1.4343*** (0.3417)	10.7736*** (3.2005)
Δg*ΔBO	1.1879 * (0.6266)	−0.2265 (0.3508)	3.1791*** (0.5248)
Hansen检验(p)	1	1	1
观测值	252	198	54

注：(1)统计结果由R语言给出，下同；(2)*、**、***分别表示10%、5%和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同。

① Frank,M W,“*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S.:A Panel Cointegration Approach*”, Working Paper,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2005.

（一）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根据表1：在总时段1992—2020年，$\widehat{\beta_1}$、$\widehat{\beta_4}$在1%的显著水平上都显著为正，表明固定资产投资是边疆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动力。1992年国家实施沿边开放战略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边疆地区的投资率逐年上升，为保证边疆地区经济的起飞和高速增长创造了前提条件。在分时段1992—2013年，$\widehat{\beta_1}$不显著，而$\widehat{\beta_4}$在1%的显著水平上正显著，且$\widehat{\beta_1}$、$\widehat{\beta_4}$变化方向相同，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要以一定的增长速度为前提。可能的解释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之前，边疆地区尚未处在开放发展的前沿地带，不同的边疆区域基于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可能获得的投资机会不一致，从而导致不同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存在差异，保持一定经济增速的区域可能更容易获得社会资本的关注和投资。在分时段2014—2020年，$\widehat{\beta_1}$、$\widehat{\beta_4}$都不显著，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对边疆经济发展的作用有所减弱。可能的解释是投资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很容易对传统发展方式存在“路径依赖”。[①]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动力有所变化，而边疆省区由于基础薄弱、创新要素不足等因素影响，如果长期依赖投资量的增加很可能会带来相应的后遗症。比如高投资推动下部分行业只是简单的规模扩张、效率依然低下；简单的投资扩张还会引起部分企业产能过剩、库存增加等。

总体而言，投资对边疆开放发展30年的拉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是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经济增长需要摆脱投资依赖，从简单的数量增加向效益提升转型。

（二）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根据表1：$\widehat{\beta_2}$在总时段和两个分时段都不显著，$\widehat{\beta_5}$在总时段呈5%水平下正显著，在两个分时段均呈10%水平下正显著。这表明边疆省份的产业结构升级还在进行之中，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还不明显，但是伴随着边疆的开放发展，其产业结构正在逐步发生改变。

一方面边疆资源型的产业特征导致其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边疆省区大多数属于生态富集区，物种资源丰富，为集聚资源型产业创造了优势条件，但是由于远离市场中心，自身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缺乏便利的交通物流条件，再加上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的相对缺乏，产业资源一直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大多数还处在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并没有获得很高的经济收益。因此，边疆地区长期以来一般都是发展自身的资源特色型产业，并结合与接壤邻国的区位优势来开展边境贸易，通道经济优势明显，但是产业加工落地却比较困难，产业特征的固化带来了产业结构的相对稳定，致使产业升级速度缓慢。从统计数据上看也有类似的结论。如表2所示，1992年边疆地区三次产业比重为23.1∶43.1∶33.7，全国的三次产业比重为：21.3∶43.1∶35.6，边疆地区第一产业比全国高1.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全国低1.9个百分点，两者差距并不是很大，都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到2020年，边疆省区三次产业比重变化为：14.1∶34.2∶51.7，全国三次产业比重变化为：7.7∶37.8∶54.5，边疆省区第一产业比全国高6.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全国低3.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全国低2.8个百分点。可以看出，经过30多年的发展，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第一产业的比重开始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开始上升，但是边疆省区由于基础

表2 1992—2020年边疆9省区产业结构变化

（单位：%）

年份	全国			边疆9省区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1992	21.3	43.1	5.6	23.1	43.1	37
2002	13.3	44.5	42.2	16.8	42.7	40.5
2012	9.1	45.4	45.5	14.6	43.9	41.5
2019	7.1	38.6	54.3	13.2	34.9	51.9
2020	7.7	37.8	54.5	14.1	34.2	51.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边疆9省区统计年鉴。

① 李佐军：《挥之不去的“投资依赖症”》，《中国经济时报》2014年6月23日，第5版。

设施、人才、资金、机制等因素制约，工业化进程和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第一产业还有一定的下调空间，产业结构还有待于进一步优化升级。

另一方面，国家战略和政府政策助推产业升级。尽管和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边疆地区由于自身造血功能不足并不具备吸引外资的优势，产业发展还有一定的差距，产业结构还有待持续升级和优化，但是从自身的发展情况看，1992年沿边开放战略实施以来，特别是兴边富民行动、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边疆省区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边疆省区产业发展也迎来了重大机遇，国家在边疆地区先后批复成立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国家开发开放重点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重点平台，使得产业载体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边疆地区凭借其区位优势，在国家和地方诸多政策的加持下，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也日益频繁，基于比较优势开始从周边国家进口原油、天然气、木材、农产品等生产资料后逐步落地加工升级，同时结合周边国家需要，大量出口电机、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等产品，进一步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三）边疆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根据表1：$\widehat{\beta}_3$在总时段不显著，在分时段1992—2013年呈10%水平下的正显著，在分时段2014—2020年呈1%水平下的正显著；$\widehat{\beta}_6$在总时段呈10%水平下的正显著，在分时段1992—2013年不显著，在分时段2014—2020年呈1%水平下的正显著。这说明自1992年边疆地区开放开发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后，边疆地区获得的政策支持、资金投入等逐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口岸开放、产业发展、贸易投资、人文交流等取得明显成效，边疆开放城市与中东部的联系日益紧密，在开放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区域支点作用。边疆开放开发逐步成为国家区域开放发展的重要一环，为东西双向互济开放格局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近年来，国家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边疆地区作为连接国内国际两大市场的重要节点和枢纽，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国内大循环而言，边疆地区尚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有利于加快吸引东部资金、技术和产业的转移，进而加快边疆地区的发展。从国际大循环来讲，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边疆地区作为连接国内腹地和周边国家的纽带，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的过程中，对沿边的基础设施、产业升级、人文交流等产生深远影响。

但是与“开放前沿”的沿海地区相比，边疆地区仍处于开放发展的初级阶段，仍面临不少问题和困难。一是与沿海地区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从经济增速上看，边疆省区过去30年的经济增速年均可达12.4%，但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进而使得边疆省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逐年在下降。[①]其中前十年边疆开放发展进展比较缓慢，致使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下滑幅度最快，此后随着国家对边疆开放政策的加持，经济增长产生的效果有所提升，这种差距逐步在减少，但只是降低了与发达地区拉开差距的速度，绝对差距还在扩大。二是周边环境复杂多变影响沿边开放发展进程。中国与14个国家接壤，由于各国之间的经济水平、历史传统和文化差异，以及周边国家内部的政治、军事、历史等因素的影响，边疆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比较复杂，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会对边疆的开放开发带来很大的影响。[②]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把因变量替换之后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的做法是用边疆9省区的人均GDP与全国人均GDP之比来代替经济增长速度，放入模型之后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3。数据结果大体一致，表明使用新的因变量进行面板数据分析时，模型所得出的结果是比较可靠的。

① 刘让群、竺彩华、陈晓：《沿边开放战略实施30年：政策演进、成效评估与未来展望》，《国际贸易》2021年第12期。

② 李光辉、黄华：《“十四五”时期我国边疆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国际贸易》2021年第10期。

表 3 沿边开放绩效的稳健性检验

	Δg		
	1992—2020	1992—2013	2014—2020
ΔlnFAI	1.2810 (0.8615)	−0.8150 (0.4982)	1.4652 (2.3563)
ΔIS	−2.2563 (1.4018)	−1.3244 (1.2558)	−0.8327 (2.4689)
ΔBO	−0.2498 (0.7353)	0.4545 (0.3906)	5.9317*** (1.0571)
Δg*ΔlnFAI	1.8298** (0.8888)	3.8849*** (0.4933)	1.4122 (0.9153)
Δg*ΔIS	2.0944*** (0.7322)	−1.5149*** (0.4215)	10.2056*** (2.4957)
Δg*ΔBO	1.1496 * (0.5964)	−0.2191 (0.3643)	2.3631*** (0.3360)
m1(p−value)	0.01	0.03	0.14
m2(p−value)	0.94	0.40	0.11
Hansen 检验(p)	1	1	1
观测值	252	198	54

五、对策建议

以上分析启示我们，要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动态调整相关政策，使得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边疆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达到最佳的状态。

（一）加强互联互通，不断提高便利化水平

第一，加快构建内外畅通的基础设施体系。要从国家发展战略出发，结合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做好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重点推进，加快构建综合、立体、高效的交通运输网络。东北区应加快推进哈长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融入大图们江国际次区域合作圈，重点推进东北亚陆海联运铁路、中朝铁路通道建设；新疆区应加速提升连霍高速公路、第二亚欧大陆桥的通行能力，做大做强天山北坡城市群；内蒙自治区依托蒙古纵贯铁路的优势深度融入中蒙国际贸易通道建设，推动呼包鄂榆城市群加快发展；滇桂区以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为契机，加快推动北部湾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参与大湄公河国际次区域合作取得新成效。积极扩展开放型经济的腹地范围，把边疆省会城市、口岸城市接入“八纵八横”的国内交通运输网，充分发挥沿边城市群的交通枢纽作用，使得边疆地区成为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中东部地区的重要节点和枢纽。[①]

第二，加快提高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优化口岸布局，完善口岸功能，加快推进口岸软硬件设施建设，重点推进一类及二类口岸联检大楼、口岸验货场、保税仓库、现代化口岸查验设施等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口岸与重要枢纽基础设施的“硬联通”。畅通边境物流通道，积极推进公路、铁路、航空运输网络建设，以边境开放城市为重点打造国际物流枢纽。

第三，为提高边疆地区开放发展的整体水平和质量，提升城市量级和产业平台的承载力，还需要提前谋划、加快布局能源、环保、教育、医疗、信息等生产性、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

（二）集聚生产要素，推动产业升级发展

第一，培育沿边特色优势产业。边疆地区具有特殊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具备发展优势特色产业的先决条件，应围绕产业为核心加快边疆地区的发展。一方面，以边疆地区特色优势农业、特色加

① 孙久文、蒋治：《沿边地区对外开放70年的回顾与展望》，《经济地理》2019年第11期。

工制造业、特色服务业为重点，形成一批有特色的产业园区和生态工业示范区，打造若干个高水平的特色外向型的产业集群和产业基地。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跨境电商等渠道，加强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产业对接协作，完善边境贸易产业链，逐渐培养综合性的产业集聚区。[①]

第二，加快承接产业转移步伐。依托自身区位优势和资源特色，结合当前全球产业链深度变革、产业链区域化和加速转移的机遇，主动加深与边境省区腹地的经济联系，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调动生产要素向沿边地区聚集。

第三，积极发展外向型产业。基于边疆省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在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集聚更多国内外资本、技术和管理等先进生产要素，推动产业链延伸和发展，形成一大批优势特色的外向型产业集群。[②]大力发展边境贸易，坚持“出口抓加工、进口抓落地”，引导加工贸易企业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布局进口资源加工转化利用项目。[③]

第四，增强沿边城市产业综合竞争力。依托沿边开放城市现有产业基础，大力发展种植业、养殖业、生态农业等特色农业，进一步做大做强能源、冶金、石化、建材、纺织服装等优势特色制造业，积极发展跨境电商、边境旅游、民族文化等服务业，构建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龙头企业为依托，通过延伸优势产业链，加快建设出口加工基地、跨境能源资源调配中心、国际商贸物流园区，吸引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向沿边城市集聚，使沿边城市完成由“通道”向“枢纽”的功能转换。

(三)加强沟通对接，持续深化扩大开放

第一，深化与邻国的边境合作。以“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为契机，完善顶层设计，加快融入“六大经济走廊”建设。推动现有合作机制和创新机制相结合，转变以经济为主的思维导向，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新的合作机制之中，设立更高的更多样的合作目标，平衡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政治与安全等诉求，推动合作进一步走深走实。在具体经贸合作领域，与周边国家探索建立产业、物流、园区合作等发展机制，推动经贸合作迈上更高水平。积极促进与周边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融合，充分发挥边疆省区与周边国家的资源、技术和市场等优势，加快推进双边合作由边境贸易向综合多元的贸易、产业合作转变，不断提升对周边国家的辐射力、带动力和影响力。

第二，加快推进沿边开放平台建设。推动边疆地区各类平台整合优化，促进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边境城镇、边境口岸、边境互市区、综合保税区、开发开放重点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各类开发开放平台联动发展，增强开放协同叠加效应。推动相关政策落地，充分运用好国家赋予边疆重点平台的政策，推动产业集聚和功能完善。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国内外资金、技术、管理、信息等生产要素向边疆重点平台集聚，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加快推动与周边国家建设自由贸易区进程。在东北亚地区，充分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等地缘优势，探索建立边境自由贸易园区，加强同外蒙古、俄罗斯的经济合作。在南亚地区，在继续深化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建设的同时，加快推动中国—印度自贸区的建立。在中亚地区，深度参与第二亚欧大陆桥和“丝绸之路”大通道建设，构建具有鲜明特色和竞争力的产业带。在东南亚地区，充分借助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发展的重大机遇，积极拓展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绿色发展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区域产业链和价值链，共同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④]

（责任编辑：唐奇展）

① 庄芮、宋荟柯、张晓静：《我国沿边开放战略思考：历史逻辑与推进方向》，《国际贸易》2021年第7期。

② 吴崇伯、张爱：《构建“一带一路”利益共同体——企业利益相关者视角》，《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③ 谭秀杰、熊灵、刘颖甜：《“一带一路”建设下沿边地区开发开放的机遇与挑战》，《边界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1期。

④ 史本叶、程浩：《新形势下我国扩大沿边开放的新战略》，《经济纵横》2016年第5期。